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尚斌 任鹏 李明珠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儒学发展史

尚斌 任鹏 李明珠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儒学发展史/尚斌,任鹏,李明珠著.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311-03058-2

I . 中... II . ①尚... ②任... ③李... III . 儒家—思想
史—研究—中国 IV .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257 号

责任编辑 施援平

封面设计 张稳移

书 名 中国儒学发展史

作 者 尚 斌 任 鹏 李 明 珠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058-2

定 价 2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尚斌、任鹏、李明珠三位给我送来了他们的新著《中国儒学发展史》，让我万分欣喜；年轻学人对于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关注与自觉探讨，让我感受到了国学复兴的融融春意。三位都是高校人文学科的年轻教师；为满足高校青年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求，编撰了这本书，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的历史发展，作了一番简括的梳理和评述，条畅而明晰，颇便青年学生阅读。书中，作者将儒家思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框架之内，以中国儒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为分期，以儒学发展史上主要人物的儒家思想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个人身世、别家论述等，吸纳哲学、历史、文学等文献史料和学术史上重要的研究成果，辨析各个历史阶段的儒学发展情况，把握儒学的源流、发展和特点，力图以广阔的视角和思辨的态度审视传统儒学在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作用、影响，功过与得失。最后，此书专立章节以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做到了既尊重历史，又启迪现实。在解决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因革扬弃的时代课题中，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很是难得。

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是学术思想活跃的年代，它启示并激励着一代年轻学人无畏地探求。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经 20 世纪数次否定之否定式的清理，也恰逢其时，如沐膏雨，呈露一派欣欣之景。全球“孔子学院”的纷纷创设，国内各种形式“国学班”的相继开

办,以至学术界对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在“后现代”价值的热烈讨论,都在表明,对儒学及整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新思考,已成为摆在所有严肃学人面前的最大课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自觉”所不能不解决的核心问题。尚斌等三位的撰述,既是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年轻学人对此的积极参与,也传达了年轻一代创建时代新文化学术的热烈诉求。在前辈学者关于儒学历史发展研究累累硕果的基础上,在诸多时贤名家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纷披迭出的高见启示下,他们师法前人,续其余绪,综理众说,振裘持领,立足时变,综核名实,力戒支缀茧缚之妄言,颇见执两用中之睿智;书中对传统学术的种种思考,可见其学术探索的勇气,及其明敏思辨的精神,都是值得嘉许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认同,就没有精神的凝聚力,就要患民族精神缺失的综合症。“十年浩劫”后社会普遍出现的“理想丧失”、“道德沦落”、“是非失据”,直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惶惑,就是典型表现。它除了告诉我们,以“摧毁一切传统”为目标之所谓革命的荒谬,以域外思想的灌输作为民族精神之再造的虚妄,却也使人们在实践中醒悟并再次发现真正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之传统的价值所在。

“仁学”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仁学简言之也就是“人学”,既有“天人关系”的内涵,而主要的还是“如何做人”——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和学问。儒家认为,从统治者到庶民,全社会各色人等各有自己的责分,如何谨守自己的责分做好“人”,使社会和谐便可以实现“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把个人如何正心修身以做人推之于家族伦理、国家社会,构成了一个封建时世的合理的蓝图。这种思想和学说,可以说,影响到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道家和佛家

思想,其核心都可以归结为关于人的问题。说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偏重于讲怎样做人的文化,我想是并不过分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人生价值学说。直至今日,从普通民众的“笃于亲”、以“孝悌忠信”为美德,到文人学士所尊崇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原则,志士仁人“见义勇为”、“有杀身以成仁”的气概,到领导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民”,“忧民”的倡扬,都可见以仁学为本的传统思想有益的承传。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有充分的论述,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力弘扬传统思想的积极的人文精神及其人生价值学说之精华,正是我从这部书中看到的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我以为,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在继承中创新,因变革而发展,正是“生生不息”之要义;抛弃传统,既无“生息”可言,而传统之变革和新生,则立足传统,容纳异端,因时生新,熔融会通均为题中不可或缺之义!三位年轻人在这一点上态度很是鲜明,是积极面向未来的。这也使我颇有感于近年来关于恢复传统的某些不一定谐和的声音。诸如抱残守缺,无视时变,置百余年来科学民主思想解放的成果于不顾,讳言儒学固有保守落后的糟粕,漠视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实事求是的艰辛探求,或者将经典随心所欲地涂上现代化的油彩予以推销,或者简单化地重开“祀孔读经”的演场,直至让天真的孩童穿着古色古香的袍褂登台出演,这样的作为,在我看来,毕竟于民族精神之复兴无补,甚者还会造成传统与现代化的益发分离!可惜,某些“执事者”对此往往有太多的热衷,而艰苦严肃的学术研讨倒往往被边缘化。这不能

不大大削弱我们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或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自主能力。尚斌等三位的撰述，无趋时附俗之华彩，有知难而行的素心，把握住当前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焦点，坚持科学与人文的旗帜，运用历史与辩证相统一的方法，对渊深复杂的传统思想文化历史，力求做出实事求是的阐释，不虚美，不隐恶，务通达，戒拘牵；虽或难免一隅之说，而一得之功固亦多多！

宋代儒学大师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深深期盼着，伴随我们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生态的日益改善，中国传统文化之水源，潺潺、浩浩，润泽万代！

承尚斌等三位将稿本惠我，于先睹为快之余，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外行话，以附卷首。

胡大浚

公历 2008 年元旦于兰州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文化产生的背景.....	(1)
第二节 中国儒学的起源	(16)
第三节 “儒”本义及儒学特质	(26)
第二章 先秦和秦代时期的儒学	(30)
第一节 孔子	(31)
第二节 儒家八派	(43)
第三节 曾子	(47)
第四节 子思	(52)
第五节 孟子	(57)
第六节 乐正氏之儒	(68)
第七节 荀子	(71)
第八节 《周易》	(80)
第九节 焚书坑儒	(90)
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儒学	(94)
第一节 汉初黄老之学和儒学	(95)
第二节 陆贾	(97)
第三节 贾谊.....	(100)
第四节 汉武帝与儒学.....	(104)

第五节	董仲舒	(109)
第六节	从儒学到儒教	(115)
第七节	两汉经学	(117)
第八节	两汉经学与儒学的演变	(121)
第九节	古文经学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123)
第十节	经学的衰微	(127)
第十一节	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形态	(130)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		(133)
第一节	经学衰落与儒学的玄学化	(134)
第二节	儒学的玄学改造	(135)
第三节	玄学调和儒道的思想演进	(138)
第四节	儒、佛、道的纷争与交融	(143)
第五节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的变迁和南北朝 时期的分立	(146)
第六节	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分立	(151)
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儒学		(153)
第一节	隋朝儒学	(154)
第二节	王通	(156)
第三节	“贞观之治”时期的儒家	(161)
第四节	韩愈	(164)
第五节	李翱	(172)
第六节	柳宗元	(175)
第六章 宋元明清时期的儒学		(180)
第一节	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81)
第二节	北宋理学的三位先驱	(184)
第三节	周敦颐	(188)

第四节	张载	(191)
第五节	二程	(195)
第六节	朱熹	(201)
第七节	陆九渊	(211)
第八节	元明时期的儒学	(216)
第九节	王阳明	(218)
第十节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224)
第十一节	黄宗羲	(228)
第十二节	顾炎武	(233)
第十三节	王夫之	(236)
第十四节	戴震	(241)
第十五节	清代理学的衰退	(244)
第十六节	清代汉学	(247)
第十七节	十三经	(255)
第十八节	儒学的衰落	(265)
第七章	近、现、当代时期的儒学	(267)
第一节	民主革命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267)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及其对儒学的批判	(269)
第三节	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	(273)
第四节	新儒学	(280)
第五节	二十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88)
第六节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总论	(297)
第七节	儒学的价值及其现代化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将进酒》

文化如河，奔腾不息，最后融入大海。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而言，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独具风采，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儒、道、佛、墨、法、兵等诸多充满智慧的思想流派以及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和嘉惠世界的科学技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代代相传，至今仍影响着炎黄子孙。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世界文化区分为西方、中国、印度 3 种类型，认为这 3 种文化各具特色，在它们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各自形成了迥异于其他二者的精神价值体系，并以此为核心产生了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主要包括欧洲、美洲、大洋洲；印度文化圈主要包括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即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地；中国文化圈则主要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

任何类型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类别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正如不

同的气候、土质条件适宜于不同的作物生长一样，不同的文化土壤自然会有不同的文化生长其上。文化土壤一般是指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这种背景需从几个不同方面加以综合说明。任何文化现象都离不开自然条件，没有自然界，我们不能进行物质生产，什么也不能创造。不同的自然条件对文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能可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中追寻到部分原因。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文化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土壤，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状况。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要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必须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活动中寻找原因。同样，社会政治状况、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不同，也会造成一个民族在思想、道德、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独特性。

大体而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国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干成分，社会组织以血缘宗法制为主。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这3个层面的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优点与缺点，都与之存在着或远或近、或浅或深的联系。

一、大陆性地理环境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

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仅仅想到‘浮于海’。”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海并不关注。

1. 半封闭的大陆

按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被粗略地区分为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希腊、罗马、英吉利、日本都是典型的海洋民族,而中华民族的诞生地却是一块半封闭大陆。我们的先民自古就生活在东亚大陆上,这里东濒茫茫沧海,西北横亘着漫漫戈壁,西南则耸立着世界上最为高峻的珠穆朗玛峰。这种一面临海(古人难以横渡的太平洋),其他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形成,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传统文化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对它的形成和延续意义重大。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断的悲剧,例如: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古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后又因恺撒大帝占领而罗马化,因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族入侵而中断,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基本上未能发生。文化学界将7种古代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它们是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而在它们之中,唯有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这其中的缘由之一,就是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的隔绝状态。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半封闭状态下产生的,所以它能独立成为一个系统,而且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一贯性。

一方面,中国不容易出现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而造成自身文化发展的断层;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内陆性,使得整个民族在坚持自己文化传统方面比海洋民族坚韧得多。这是因为大陆民族在比较封闭的圈子里活动,其所能吸收、借鉴的外来文化相对较少,外来文化对它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因此,人们更看重自己的文化传统。

半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观念,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还误以为天下只有

华夏民族和散落在自己周围的蛮夷部落而已，因而往往把所谓“天下”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以为天底下没有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中国”一词表现了中国人把自己的栖生之地视为世界中央的概念。

正由于中国东部濒临太平洋，西北和西南又为沙漠和高原所阻隔，无论海上通商或陆路贸易都非常困难，再加之中华民族的诞生地黄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源充沛，物产丰饶，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是中华民族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比较淡漠，甚至常常流露出严重的海洋恐惧情绪。但是，中国的农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几乎达到了成熟状态，这不仅体现在农产品的广泛种植和衣食有安，而且体现在作为农业载体的土地直接切分出了中国古典社会形态的具体生存结构，也切分出了氏族和领地，宗法制和分封制，婚姻习俗和家庭单位，利益交换原则，甚至幸福目标和社会理想。新石器时代的庞大农业空间和完整的农业化社会结构，确保了中国与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一道成为4个“早熟的儿童”（马克思称赞古希腊神话时的引譬辞令），或者说四大文明形态，同时也奠定了未来几千年农业持续延伸和阶段发展的牢固基石。自商周直至晚清，中国社会基本上保持着农业社会的品格，只不过社会内部更细密、更繁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天子至庶民，由文人墨客至娼丐，几千年的中国人事实上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所谓皇上不过是由家族膨胀为国家的地主。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就是以中国社会作为背景持论的。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广义上和根本上显然是成立的。

2. 回旋余地极其宽绰

中华民族的栖生之地是一个半封闭性的大陆，但是，这又是一块极为辽阔的大陆，其面积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由于疆土广袤，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平原毗连，较少存有过于突出的天然屏障阻断，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当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时，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回旋，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

亮，黑了北方走南方。而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明地区沦陷于外族入侵时，往往一蹶不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将入侵的外族潜移默化，甚至使之同化，从而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二、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

1. 以农为主的经济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自然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发展农业，这导致了近代以前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极小。

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中的神农氏就是因其教民农耕而得名。据考古学家考证，早在 7000 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已经出现了农业文明的曙光。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上发现了成堆小米，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谷物栽培痕迹。黄土高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数百万年来，西北季风将内陆荒漠的沙尘吹扬到黄河流域堆积形成黄土，同时，黄河及其支流也不断地将大量泥沙输送到下游，形成华北平原。我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发生的旱灾、洪水、飞蝗、瘟疫和饥荒等社会影响可谓触目惊心。虽然“环境决定论”有失偏颇，但是，古今中外环境资源条件的变化对于经济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地质学家研究，黄土高原的形成多半是由数十万年前从戈壁吹来的黄沙覆盖而成，其土质结构松软多孔，有较强的渗水性，遇到雨水，可以像海绵一样对水分起到保存作用。再加上黄土风化程度较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不易流失，具有较强的肥力。因此，早期人类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在相对干旱的环境下，以种植耐旱谷物为食粮，反映了我们先民的智慧。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比较适宜于古代农具的运用，因而，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农业生产,帝王们都有耕籍田、祷求雨、劝农事的仪式和措施。中国农业技术比较发达,农具的制作、牛耕的推行以及农书的刊行等,都曾领先于世。三代时期,农耕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中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之歌》)便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商业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农业则基本上转向小农经济。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开始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秦汉之后,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而崇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更加严重起来。从汉武帝采取抑制工商业的政策之后,以工商为末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此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几乎都把崇农抑商当作基本国策。汉初贾谊提出要“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论积贮疏》);汉末王符提出崇本抑末;北宋欧阳修说:“知赋敛财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也”(《原弊》);明朝刘基说:“耕,国之本也,其可废乎?”这种重农抑商、崇本息末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比如曾国藩就推崇“耕读为本”。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商品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始终处于被扼制的地位,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不可能独立发展起来。

2. 农业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发育的,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农业文化。农业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依赖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多于抗争自然,从而逐渐形成“天人合一”、“天人协调”的思想观念。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适宜的气温、雨量、灌溉等条件。自然条件好,农业易于丰收,所谓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如果发生灾情,收获就难以保证。所以,农业一要靠人的努力,二要靠天的配合。农业生产的这两个特点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特性。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努力的积极性被削弱了,严重束缚了我们华夏民族的创造力。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与外部世界经常处于隔绝状态。农民一生中的许多时光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劳作循环往复。由此养成了因循守旧、不图进取、安于现状的心理。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未尝先人而常随人”等等，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但在农业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得到培育。

农业社会的政治观念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且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社会，需要产生君临一切、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这便是东方专制主义诞生的温床。它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权利，将国家的军、政、财、文等大权全部集中到君王以及朝廷手中。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就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君主政体，而欧洲直至中世纪晚期才出现类似政体。这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民的安居乐业。唯有如此，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赋役才能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广大农民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溃、民变就会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社会大厦和统治安定。因此，重民思想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之道。中国士大夫往往忧国忧民，忧民正是民本主义传统的体现。民本思想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散发着浓郁的民本主义气息。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之一。

农业经济也培养了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观念。中国民众在农业劳动过程中领悟到一些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中国人很少去玄想人世之外的事，他们是入世的，更多关心人的现实生活；抽象的宗教难以被中国人所接受。因为过于注重实用知识，中国人又少了几分对科学理论的热情。那种